

# 从《英文学史》到《宋元戏曲史》

## ——“文学史”观念的旅行与王国维的域外资源

周 旻

**内容提要** 1907年，王国维在其主编的《教育世界》杂志“传记”/“史传”栏中，陆续刊印了数篇西方文学家的传记，是为其转途文学的风向标。其中《莎士比传》《倍根小传》《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》三个文本翻译自日本近代文学理论家坪内逍遥所撰写的《英文学史》(1901)。王国维通过择译，接纳和改造了“文学史”这一新的述学文体。他从坪内文学史中所习得的“批评”“比较”“述史”的方法，呈现在1913年所完成的《宋元戏曲史》一书中。对上述文学家小传和底本的考察，有助于呈现“文学史”观念在东亚的旅行过程，以及王国维展开文学研究时所借助的资源。

**关键词** 王国维；坪内逍遥；文学史；《宋元戏曲史》；《英文学史》

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时期的重要学者。《〈红楼梦〉评论》《人间词话》《文学小言》等论著，兼具西学与中学，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崭新的“文学”概念。其中，应商务印书馆之邀、成书于1913年的《宋元戏曲史》，在行文、体式上都可算是清末较为完整的一部文学史，为王氏文学研究时代之殿军。傅斯年赞其“条贯秩然，能深寻曲剧进步变迁之阶级”，符合“近代科学的文学史”，“且具世界眼光者也”<sup>[1]</sup>。过往研究多重视王国维与德国哲学的关系，认为诸作中所展露的理论素养、批评术语、文体意识来自于叔本华、康德、席勒的美学思想。由于材料的缺乏，这些研究忽略了域外文学资源在学术方法上的影响，对《宋元戏曲考》的材源尚停留在同时代日本学界对中国古代戏曲的挖掘与研究上；于傅斯年所谓之“世界眼光”，则遗失了欧西文脉的重要面向。本文发现清末由王国维主编的《教育世界》杂志在1907年陆续登载的《莎士比传》《倍根小传》《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》三种文学家小传，实译自坪内逍遥《英文学史》(1901)。坪内逍遥(1859—1935)此作是明

治日本“文学史”写作的典范文本，不仅历史框架清晰、史料丰富，而且具有独到的批评见解，是观察近代日本接受西方“文学史”体例的绝佳对象。事实上，“文学史”观念在日本的流行，始于对法国批评家泰纳(Hippolyte Adolphe Taine, 1828—1893)的民族文学史理论的接受，即“种族—环境—时代”三要素论<sup>[2]</sup>。这也是《英文学史》全书结构之范式。本文拟从小传底本与译作的跨文化语境入手，以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家—坪内逍遥—王国维为线索，还原“文学史”观念在东亚的旅行之途；并为王国维文学研究的域外资源与知识谱系之“上下文”提供关键性补充。

### 一 《教育世界》 与坪内逍遥的《英文学史》

1901年5月，《教育世界》由罗振玉创刊，历时8年，1908年1月终刊。以第68号为界，分为前、后两期。前期“每册前列论说及教育规则与各报，后附译书”<sup>[3]</sup>，有“文篇”与“译篇”两个栏

目。1904年,王国维成为杂志的实际主编后,大异其趣,对刊物的体例、栏目、内容作出调整:一方面引入“诸家精理微言”“各国良法宏观”“名人嘉言懿行”,扩大教育的界限;一方面剔除“浅薄之政论”及“一家之私言”<sup>[4]</sup>,重视教育学的纯粹性。同时增加“学理”“传记”“小说”“丛谈”等多个栏目。对照前后两个时期,王国维主理的5年中,教育、哲学、文学成为《教育世界》的三重底色。

王国维发表在杂志上的正式文章,部分收入《静庵文集》及《续编》,诗词创作则题以《人间词甲稿》《乙稿》《静庵诗稿》,刊登在“文苑”栏。此外,他还留下了一批未署名的佚文,译文更是从未入集。佛维辑录44篇文章,编成《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》;陈鸿祥扩大辑佚范围,认为“小说”栏也出自王国维手笔<sup>[5]</sup>。在此基础上,钱鸥对未署名文章做了更细致的考察,发现其中13篇的日文原文。底本的“出土”展现了明治30年代日本思想界对王国维的深远影响,钱鸥总结道:“这一时期王国维虽然没什么直接论述日本学术、思想的文章,但他研究日本学术的精粹,吸收进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中去。”<sup>[6]</sup>据此可见,佚文的真实情况需作具体的讨论。前辈学者的研究还提示了两个关键信息:王国维对著述与翻译分茅设藪,前者为主要工作,后者则是“准备”;但是对重要的未署名文章展开调查考据,有助于细致地还原王国维学术资源之由来、脉络之变化。

佚文中数量最多的是登载在“传记”栏中的名人小传,计20篇。第68号之前,作为“教育”主旨的补充性材料,仅有9篇教育家小传面世<sup>[7]</sup>。1904年后,传记一跃而成为正式且重要的栏目,主编寄望“录名人嘉言懿行,以示激励”,刊登了39篇小传和32幅肖像。因着王国维的接手,也增添了文学和哲学的名家,有15篇哲学家小传和8篇文学家小传陆续登场。涉及文学的有:《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》(1904年3月第70号)、《格代之家庭》(1904年8、9月第80、82号)、《脱尔斯泰传》(1907年2月第143、144号)、《戏曲大家海别尔》(1907年3-4月第145、147、148号)、《英国小说家斯提逢孙传》(1907年5月第149、

150号)、《莎士比亚传》(1907年10月第159号)、《培根小传》(1907年10月第160号)、《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》(1907年11月第162号)<sup>[8]</sup>。

1907年一年间,《教育世界》就刊出了6篇文学家传记,传主依次为托尔斯泰、黑贝尔、斯蒂文森、莎士比亚、培根、拜伦。除了较为特殊的《脱尔斯泰传》<sup>[9]</sup>,其余5种呈现出相对统一的风格:1.生平详细、完整,穿插时代事件;2.重视作品;3.中、英夹杂,如《英国小说家斯提逢孙传》中甚至出现了《内河航行记》的英文原文;4.对作品或作家风格附有批评文字;5.体现出西方“文学”(literature)的分科(小说、诗、戏剧、散文),挑选的传主在文类形构中具有典范作用;6.在论述、评价传主时,常以该国文学的变迁或文体的发展过程为定位系统,如黑贝尔在北德戏曲之机运中的崛起,斯蒂文森于英国小说界作为“新罗曼派”第一人的重要性,培根之文受当时英诗的影响等。由此可见译者慧眼独具的文学品味,学术研究的专业态度,以及对现代“文学”“文学史”概念的认知和接受。

文学家小传与王国维对“文学”的论说,亦存在种种关联。例如,1904年发表的《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》,视二人为“活国民之思潮、新邦家之命运者”。同年,在《教育偶感》的“文学与教育”一条中,王国维有相似的议论:一国之文学家“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,而国民之所恃以为生命者”<sup>[10]</sup>。此外,《合传》以“感情的之人”“意志的之人”指涉歌德、席勒在文学上的相异取向,则留存着哲学研究的痕迹。若此传的读者曾翻阅1902年王国维编纂的《哲学小辞典》一书,便可对照“感情”“意志”的定义,对两位文豪的区别获得更为深入的、异质于古典文论的理解<sup>[11]</sup>。王国维当时有意将哲学中的美学论述应用于文学批评,《合传》的写作可能是一种尝试。而1907年发表的《莎士比亚传》和《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》,则关涉王氏后来的词曲研究。比如“主观的诗人”与“客观的诗人”,稍后又出现在《人间词话》:

当知莎氏与彼主观的诗人不同,其所著作,皆描写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,以超绝之思,无我之笔,而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也。<sup>[12]</sup>

夫强于情者，为主观诗人之常态，但若是之甚者，白衣龙一人而已。<sup>[13]</sup>

一七 客观之诗人，不可不多阅世（手稿之一〇六“不可不知世事”）。阅世愈深，则材料愈丰富，愈变化，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之作者是也。主观之诗人，不必多阅世。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，李后主是也。<sup>[14]</sup>

“主观”“客观”“我”三组概念互相作用，构成哲学思想中“物”/“我”的认识论，同样也可以在《哲学小辞典》中找到抽象层面上的意义闭环<sup>[15]</sup>。罗钢认为，《人间词话》中“客观诗”“主观诗”的区别，取自德国美学家的著作，除了叔本华的直接影响，还吸纳了席勒的素朴诗与感伤诗的审美理论<sup>[16]</sup>。以此反推，早于《人间词话》的《莎士比亚传》和《白衣龙小传》，理应共享着同一套哲学资源。然而，这两篇小传却并非受哲学或美学影响的自撰之作，而是与《培根小传》译自同一部日文著作：

《莎士比亚传》——坪内逍遥著：《英文学史》第二编第九章「シェークスピア」，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，1901年

《培根小传》——同上，第二编第六章「フランシス・ベーコン」

《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》——同上，第五编第四章「バイロン」

《英文学史》的作者是日本文学理论家坪内逍遥。坪内1883年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，进入东京专门学校（早稻田大学前身），1890年后担任英国文学的讲授工作，《英文学史》的最早版本便是坪内的课程讲义<sup>[17]</sup>。1901年，该校出版部整合一批与“纯文学”相关的著作，以“文学丛书”之名重刊，坪内逍遥的《英文学史》成为该系列推出的第一部再版书<sup>[18]</sup>。全书分为五编：上古时期、伊丽莎白朝、内乱时代、十八世纪、近代。每编由若干章组成，以人物评传串联起一时代文学之面貌。与讲义版相比，1901年版“将起稿的内容进行了数次改补”<sup>[19]</sup>，见证了四五年间坪内逍遥的累积与文学眼光的改变。《莎士比亚传》中莎氏诸作的出版情况，《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》对第一部诗集《闲日月》的介绍，都是1901年版添加的新材料、

新内容。两版关于培根的内容差别最大，王国维《培根小传》则完全依据1901年版翻译。据此可以断定，三种小传的底本是“文学丛书”中的《英文学史》一书。

## 二 明治日本“文学史”的知识图谱

坪内逍遥最为世人熟知的是1886年出版的《小说神髓》，它也是日本小说改良运动宣言性的理论著作。“小说的眼目，是写人情，其次是写世态风俗”<sup>[20]</sup>，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了“小说”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蜕变，掀起了写实主义风潮。坪内借镜西洋“文学”（literature）的定义与分类，改造了沿袭自中国学术体系的文章观，抬升了“小说”“戏剧”的文类层级。他所坚持的“文学的本质”，即“文学的意义及目的，都是为了对人生进行批评（criticism）”<sup>[21]</sup>，取道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坛的批评理论。

如此看来，《教育世界》对坪内逍遥所撰《英文学史》的翻译，就不只实现了对文学家生平知识性（knowledge）的输入，更重要的，是引介了坪内逍遥所代表的明治日本关于“文学史”的知识图谱，包括文学课堂、文体典范、批评范式三个方面。以往在讨论王国维1907年文哲转型问题时，国内外学者通常聚焦于《人间词话》中的文艺理论，认为他受到德国现代哲学与近代日本文学观念两方面的影响，例如“意境说”的来源；展开分析与材源的依据，大部分来自两篇《自序》及《静庵文集》中的自撰论文，或有很好的联想发挥，如“意境说”与田冈岭云思想的深层关系，但仍囿于材料而略显单一。在此意义上，坪内逍遥及其背后的日本明治时期文学史教育、述学文体、观念变革等丰富的内容，是王国维较为特殊的域外资源。从情理上考量，他对日本教科书的注意，由来已久，特别是东京专门学校，早在1901年短暂留日后，他就曾译出几种讲义以饷读者。从王国维的学术理路上分析，专门史在他的学术准备工作中居于起点位置，他由文学史一窥文学研究的面貌，并规划自己大展拳脚的领域，这与他1902年开始从事哲学思考时的路径是一致的。因此，坪内逍遥与王国维

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难以确证，但汇总他的学术判断、志向、门径等多个方面的信息，仍然可以感受到二者在文学研究领域有相似的趣味与取向。

东京专门学校在1890年增设了文学科，以“和汉洋三文学之形式与精神兼修”<sup>[22]</sup>为其教学要务。学科的设置又与“文学史”这一体式在日本的输入和流行息息相关。大约在1887年前后，法国批评家泰纳的《英国文学史》进入日本，被广泛传播。因应于此，1890年，三上参次、高津锹三郎撰写了第一部《日本文学史》；此后，讨论日本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层出不穷，引发热议。在强大的西潮冲击和思想变革中，日本知识分子不得不抛弃传统汉学的统摄，重新厘定“文学”；使它从广义学术的范畴转向诗、小说、戏剧为中心的文类集合概念，“表达人的思想、感情、想象”<sup>[23]</sup>的定义取代了道德伦常、“文以载道”的文学观念意涵。凝聚着国族想象的“文学史”也逐步取代了文法、作文、译读，成为高等教育文学科的主要教授内容。以东京专门学校为例，文学科的学生须在三年内完成日本文学史、中国文学史、英文学史、美术史等课程。因此，该校的教师们开始编写和、汉、洋三种文学史讲义。较早的一批成果包括斋藤木的《支那文学史》（1892—1893）、藤田丰八的《支那文学史》（1895—1897）、池谷一孝的《日本文学史》（1897）以及坪内逍遥的《英国文学史》（1895—1897）。

坪内逍遥执笔的《英国文学史》（讲义）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。自然主义评论家长谷川天溪（1876—1940）曾总结坪内的文学史课程特色为“具体的”“艺术的”“诗的”<sup>[24]</sup>。课堂中的身临其境之感，讲述形式、内容、材料的丰富，都得益于坪内逍遥的文学修养。与传统汉学家不同，坪内的文学启蒙始于英文的学习和翻译实践，跨越和、英两门语言的体验，使其善于旁征博引、博采众长。他的“文学史”讲义不囿于一时一家之言，知识与学术趣味兼备。这些特质得益于他所涉猎的西方文学史资源，这些著述皆是经典之作，坪内谈到几个时段引用、参考的资料主要来自布鲁克（Stopford Augustus Brooke）、道顿（Edward Dowden）、戈斯（Edmund W. Gosse）、泰纳（Hippolyte Adolphe

Taine）和圣茨伯里（G. Saintsbury）这五位学者<sup>[25]</sup>。他们均为19世纪最负盛名的文学研究者，也是明治时期流行的批评家。周作人回忆初入东京购买的文学书，便有“圣兹伯利的《英文文学小史》一册与泰纳的英译本四册”<sup>[26]</sup>，他的早期文论也常引用或复述；可见这两位文学史家的普及程度<sup>[27]</sup>。因此，坪内的著作也可说是集一时“文学史”之大成：布鲁克的专长是品鉴诗歌，道顿成名于莎士比亚的研究，戈斯是重要的评论家和翻译者，而圣茨伯里是一位涉猎极广的文学史家。泰纳的重要性自是毋庸赘述，坪内《英国文学史》（讲义）初稿的框架直接脱胎于泰纳《英国文学史》的体系。

然而，这些泰西学者对“文学史”的见解又有很大差别。戈斯和圣茨伯里强调文学是一门艺术，在讨论文学运动、发展进程、时代背景等历史性问题时，却显得捉襟见肘。布鲁克是纯粹的鉴赏派，缺乏总体性的论述和史才。道顿和泰纳更关注文学中的进化问题，强调社会、时代因子的作用，是19世纪文学史研究的主流。不过，道顿信奉斯宾塞，泰纳选择黑格尔，二人在很多观点上存在着分歧<sup>[28]</sup>。1901年《英文学史》出版后，就有评论者指出，置诸家文学史于一书之中，难免混乱与粗糙<sup>[29]</sup>。即便如此，经过剪裁、重组、编辑，坪内还是使《英文学史》达到了一种兼备所长的“平衡”：既没有过分强调文学的外部，也不再依赖主观的阅读感受。

以《教育世界》所挑选的莎士比亚一章为例。此篇按莎士比亚生平和著作的四个时期组织论述结构，主要参考了两种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，著作分期则来自道顿的《莎士比亚入门》（*Shakespeare Primer*, 1877）一书<sup>[30]</sup>。在中心论点上，坪内基本继承了泰纳对莎士比亚的两个评价，即“准确地表现真实生活细节”和“无限丰富的想象力”，并一改其散漫的文风，论述更为集中<sup>[31]</sup>。《英文学史》成稿前，坪内曾为《麦克白》的日译本撰写《绪言》，认为他的作品既是“造化的本体”，又“几乎容纳了万般的理想”<sup>[32]</sup>。这篇文章亦可作为莎士比亚章节的前身。不过，评论文章更强调自己的感受、联想和发现，文笔繁复，旁逸斜出。当感性的观点进入文学史时，最显著的变化有二：其一，

坪内剪去了主观性的鉴赏，转用第三人称评述；其二，他将大段的论述浓缩为精炼的概念和简短有力的判断，穿插于历史细节之间，比如提出“第二之自然”“第二之造物”<sup>[33]</sup>的观点，取代原本“造化的本体”一说，最后以“客观”二字收束，可以说非常成功地论述了莎士比亚的文学特性。坪内借鉴19世纪英国文学研究的成果，作为章节的时间线，在阅读、翻译、介绍《麦克白》的过程中，他酝酿了核心观点，同时总结并参考了泰纳的重要论述。最终，他以客观、稳定的形式，将自己的感受融入讨论文学变化的历史叙述当中，完成了“文学史”中的“莎士比亚”。

从杂志上的评论文章，到学校里的文学课堂，再到作为流通出版物的“文学丛书”，场域、载体、对话对象的递变，影响了坪内笔下“文学史”的面貌——虽然主观性的观点受到很大限制，但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章节既有学术性的资料收集，又有创造性的阅读感受，生动具体，有很强的总括性、可读性和传播性。坪内在《英文学史》中尝试捏合各色理论，则表明“文学史”观念在中转站“明治日本”加强了自身的力量，并被改造得适应于东亚文化的语境。

### 三 《宋元戏曲史》： “文学史”观念的旅行与改造

对照原文，《教育世界》上的三种小传大体是忠实的翻译。改动较大的是删除了坪内逍遥的“引言”。原文“莎士比亚”章前，交代莎翁生平“模糊零碎”的研究情况，介绍该章使用的最新材料。“培根”章的“前言”最长，论述17世纪以来英国学界以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和“演绎论理法”为中心的学院派已行至末流，亟需学风的革新，而培根的出现正是对空泛说理学风的反叛，其致用之文开启了新的学说。原文“拜伦”章前主要概述拜伦思想的革命性与破坏性如何在18世纪席卷欧洲文坛<sup>[34]</sup>。三段前言服务于“文学史”的述学范式，或承前启后，或提纲挈领，都与“由某个诗人代表某个时代”的述史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
《教育世界》对“前言”的裁剪，表明关于

“文学史”中作家传记的文体意识正在逐步形成。对于主编王国维而言，除了“教育”之优良材料外，“传记”的学术意义还来自叔本华在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中的界定：“就认识人的本质说，我甚至不得不承认传记，尤其是自传，比正规的历史更有价值，至少是以习惯写成的历史比不上的。”<sup>[35]</sup>与“历史”相比，“传记”中个体动机与意志的关系是更为明确的，人的本质更易被把握。

叔本华的定义提醒了王国维“个体史”的重要性，而将西方传记翻译为中文，在晚清的文化语境中又会面临新的挑战。首先，是欧西名人传记与传统史传的格调（style）差异。吴汝纶谓“欧洲纪述名人，失之过详，此宜以迂、固史法裁之”<sup>[36]</sup>，“过详”则近于“小说家言”，是为体式不洁，翻译名人小传当别裁以“史法”。他推荐“叙记”“典志”二门对译“欧洲国史略”，这一策略正暗含了晚清翻译与古文体例的冲撞和商榷，深受古典文章学熏陶的近代知识人在输入新的书写形式时，或无法规避。“史传”之外，文学家小传最接近的传统文体是“文苑传”。与吴汝纶以中律西的视角相反，钱基博尝试从西方“文学史”的概念，反观历代正史中的《文苑传》，以其“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”点出“文学史”写作的主旨在于“说明文学著作”的成因，文学家之履历是必要的材料，但非充要的内涵。得出此结论的根据，恰好来自泰纳，所谓“欲研究一种著作，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、环境及时代”<sup>[37]</sup>。两相比较，“文学史”中的作家传记在铺叙履历之外，更重要的职能（function）是“因世以求文”，以“时势身世”探求“作品之发生”与“位置之轻重”<sup>[38]</sup>。

文学家小传与“史传”“文苑传”其实都存在距离，本质上它所归属的“文学史”是完全异质于传统“文史”观念的、新的学术文体，既非“史”亦非“文”。但在跨语际实践中，又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已有的文类系统发生对话。三篇小传中改动最大的《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》便是显例。此篇只译出了原文的一半内容，删减的是拜伦与雪莱的比较、英国诗坛的更迭与传承、拜伦流行欧洲的原因等<sup>[39]</sup>。删繁就简，一方面是将《白衣龙小传》限定在“个体史”，符合“传记”栏目的初衷；另一

方面则表明“文学史”观念在晚清接受语境中遭遇的“抵抗”和困境。其中历史的、纪实的、科学的部分容易被接纳<sup>[40]</sup>，而文学内在之机理、风气之流布、变迁之动因等研究性的文字，则较难得到理解和运用。

还应注意，到“文学史”首先是被王国维放置在“教育”的方向上理解的，作为先进的教育体制、学科分类、教学方法的重要代表而被他关注到<sup>[41]</sup>。因此，虽然《教育世界》只译介了坪内逍遥《英文学史》中的三篇文学家传记，且进行了剪裁，但事实上，该书对时代、环境、作家作品、文学体式的新的批评范式，已无可避免地影响了王国维对文学的理解，同时亦被其“改造”。《屈子文学之精神》分“吾国之文学”为南北两种思想，便是学习了文学“比较（comparative）”的方法<sup>[42]</sup>。《自序二》中他预告有志于戏曲，并将“理想及结构”作为衡定的标准，明显受到莎士比亚传记中研究方法的启发，试以西洋戏剧的体段辨析杂剧、传奇的文体成型问题。而当述学文体转换为正式的文学史时，他从“传记”中习得的内容就更鲜明地体现出来。

成书于1913年的《宋元戏曲史》在体式和行文上都是较完整的一部文学史。《自序》中言明此书需要解决的是“元之曲”的问题。全书分为三部分，第一至七章为元杂剧前的戏曲，第八至十二章单论元杂剧为真正戏曲的原因，十三至十六章为与元杂剧同时代的戏曲；全书以“戏曲”概念的完成为内在动力，由上古至元代“明其变化之迹”。由此，三个部分便也可概括为溯源、成型、比较。

开篇《自序》中，王国维便提出了“凡一代之文学”。浦江清认为王氏参酌并观了叔本华与焦循之说，“悟历代文学蜕变之理”<sup>[43]</sup>。若将坪内逍遥的《英文学史》及泰纳等人的文学研究衬入其说的背景，则不难发现“一代之文学”中有意以“种族”“环境”“时势”“个人”四种因素整理文学现象（作家、作品、文体）变迁的痕迹。

具体而论，例如第八章“元杂剧之渊源”，此章首先承接上一章对元杂剧下了判断，“至成一定之体段，用一定之曲调”；然后分乐曲和叙事体两端阐明其“视前代戏曲之进步”；接着讨论元剧在形式上对前代旧曲的借鉴和沿用，点明章节标题中

“渊源”二字，并总结“元剧虽有特色，而非尽出于创造”<sup>[44]</sup>。从此章的安排和论断中，可以发现王国维对“变迁之迹”的把握主要集中在关键性概念的分辨上，比如进步与非进步、创造与非创造。这与《莎士比传》采用“理想”与“人情”的分析，划分莎士比亚著作的成型时期，颇为相似<sup>[45]</sup>。类似的情况还有第十二章“元剧之文章”。此章提出以“自然”为评判元剧佳处的标准，包括剧作的思想结构、文章、语言三个方面，如“胸中之感想，与时代之情状”，“写情则沁人心脾，写景则在人耳目，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”；“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，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”，“多用俗语”<sup>[46]</sup>。而坪内逍遥在《英文学史》中推莎士比亚为英国民族性的代表，“以超绝之思，无我之笔，而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也”，称其为“第二之自然”<sup>[47]</sup>。在坪内的视阈中，“自然”是一个审美概念，决定了“客观的诗人”与“主观的诗人”的高下，同时也是《英文学史》暗含的价值框架——据此，坪内分梳了作为客观诗人的莎士比亚和作为主观诗人的拜伦、斯威夫特。

这两章的例子提示了“持古今相同价值之论”<sup>[48]</sup>是组织文学史的有效方法。《宋元戏曲史》第三部分的重头戏，则是“比较”。第十五章开篇，王国维抛出结论，“故元代南北二戏，佳处略同；唯北剧悲壮沉雄，南戏轻柔曲折，此外殆无区别。此由地方之风气，及曲之体制使然”<sup>[49]</sup>，并佐以南戏《拜月》和关汉卿所作杂剧《闺怨佳人拜月亭》的细致对读。文章末尾重点分析了《琵琶》一曲中“兼南北之胜”的片段。如果细读此段与《白衣龙小传》的结尾，会发现二者有着相似的批评结构：

此一出实为一篇之警策，竹垞《静志居诗话》，谓闻则诚填词，夜案烧双烛，填至吃糠一出，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，双烛花交为一。吴舒凫《长生殿传奇序》，亦谓则诚居柝社沈氏楼，清夜案歌，几上蜡炬二枚，光交为一，因名其楼曰瑞光。此事固属附会，可知自昔皆以此出为神来之作。然记中笔意近此者，亦尚不乏。此种笔墨，明以后人全无能为役，故虽谓北剧南戏，限于元代可也。<sup>[50]</sup>

白衣龙之为人，实一纯粹之抒情诗人，即

所谓“主观的诗人”是也。其胸襟甚狭，无忍耐力自制力，每有所愤，辄将其所郁之于心者泄之于诗。故阿恼德评之曰：“白氏之诗非如他人之诗，先生种子于腹中，而渐渐成长，乃非成一全体而发生者也。故于此点尚缺美术家之资格。彼又素乏自制之能力，其诗皆为免胸中之苦痛而作者，故其郁勃之气，悲激之情，能栩栩于诗歌中。”此评实能得白衣龙之真像。盖白衣龙非文弱诗人，而热血男子也，既不嫌于世，于是厌世怨世，继之以骂世；既骂世矣，世复报复之，于是愈激愈怒，愈怒愈激，以一身与世界战。夫强于情者，为主观诗人之常态，但若是之甚者，白衣龙一人而已。<sup>[51]</sup>

称之为“批评”是因为评论的基础不完全是主观的阅读感受，还倚重他人之言。坪内引用的阿恼德，即马修·阿诺德（Matthew Arnold，1822—1888），是英国19世纪重要批评家之一，他的《批评二集》是了解19世纪浪漫主义诗坛的必读经典。王国维提到的竹垞，即清初词人、学者朱彝尊，是清代词学复兴的代表；吴舒凫则参与了《长生殿》的问世过程，其序是重要的曲学评论。“引用”知名学者巩固自家的判断，使其“不再姝姝一先生之说”，并且展示同一问题古往今来的研究成果和不同时代的立场。更重要的是王国维站在前人议论的肩膀上得出了全篇结论：在《宋元戏曲史》，是“北剧南戏，皆至元而大成，其发达，亦至元代而止”；在《白衣龙小传》，是主观诗人之甚者，白衣龙一人而已。这都是具有结构性的论断，可作用于文学史的整体。由此，著、译两段文字都体现了“批评”的客观性和学术感。

坪内逍遥在《英文学史》中对五位学者的剪辑、重组、衔接，是“文学史”在日本被再现、编码和制度化的过程，其中又不乏作者对不同文学立场的见解的综合与创造性的发挥。坪内糅合19世纪西方文学资源为自家学术之一脉的《英文学史》，其“传记”的部分通过1907年《教育世界》的翻译，抵达了中国知识界；其“文学史”的部分，包括对时代、作家作品、文学体式的新的批评范式，也借路“翻译”活动进入王国维的学术脉络，成为其潜在的文学资源。王国维在接纳了这一述学文体

的过程中，一方面是受动的，因“文学史”体式异质于传统文脉中的“史传”“文苑传”而进行了删改；另一方面又是主动的，在《人间词话》《宋元戏曲史》的写作中改造并化用了坪内用以结构“文学史”的概念与方法，完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史写作发轫期的一次探索。

[1] 孟真（王国维）：《宋元戏曲史》，《新潮》第1卷第1期，1919年1月3日。

[2][23] “因邦国不同，而具备其固有特质之文学，即所谓国文学（National Literature）。”三上参次、高津敏三郎：『日本文学史』，第25页，第13页，金港堂1890年版。关于明治日本知识分子期盼借由文学的国族化，迈向西洋定义的“近代”这一问题，参见斋藤希史《“汉文脉”在近代：中国清末与日本明治重叠的文学圈》，盛浩伟译，第30页，群学出版社2020年版。

[3] 罗振玉：《教育世界序例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1号，1901年5月。

[4] 《本报改革广告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68号，1904年2月。

[5] 《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》，佛维校辑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。陈鸿祥：《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》，第212—231页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。

[6] 钱鸥：《王国维与〈教育世界〉未署名文章》，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00年第4期。

[7] 关于各篇的性质特点，已有研究论文，参见朱颖《转道日本打开欧美教育之窗——清末〈教育世界〉（1-68号）初探》，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8年。

[8] 另有《教育家之希尔列尔》一文，是德国文学家席勒的传记，然因其定名为“教育家”，文中主涉教育理念，故不算在“文学家”之列。参见《教育世界》第118号，1906年1月。

[9] 周旻：《王国维译〈脱尔斯泰传〉底本考释》，《汉语言文学研究》2021年第2期。

[10] 王国维：《教育偶感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81号，1904年8月。

[11] “感情 Feeling：感情者，内外界之情势，与知识及意志相伴，而兴起于心界之精神现象也。”“意志 Will：意志者，精神自动作之作用之总名也。”《哲学小辞典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30号，1902年12月。

[12][33][47]《莎士比亚传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159号，

1907年10月。

[13] [51] 《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162号，1907年11月。

[14] 陈鸿祥：《〈人间词话〉〈人间词〉注评》，第50页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

[15] “客观 Object：客观者，对主观言之，谓非我之外物也。”“主观 Subject：主观者，对客观而言，谓我也心也。”“我 Ego：我者，非我之反对，而为主观者也。”《哲学小辞典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30号，1902年12月。

[16] 罗钢：《传统的幻象：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》，第349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17] 坪内雄藏：『東京専門學校文學教育科第一回一學年講義英国文学史』，早稻田大學出版部。此讲义出版时间不详，推测为1895—1897年。

[18] [19] [25] [34] [39] 坪内逍遥：『英文学史』（文学叢書第1編），第1頁，第2頁，第2頁，第205頁、第206頁、第163頁、第164頁、第600頁，第605頁，東京専門學校出版部1901年版。

[20] [21] 坪内逍遥：《小说神髓》，刘振瀛译，第47页，第55—56页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22] 陈广宏：《中国文学史之成立》，第78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。

[24] 長谷川天溪：「教壇の人としての逍遥先生」，转引自千葉龜雄『坪内逍遥伝』，第219頁、第220頁，改造社1934年版。

[26] 周作人：《东京的书店》，《周作人文类编7·日本管窥》，钟叔河编，第77页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。

[27] 1908年发表的《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》及《哀弦篇》中出现了泰纳、布鲁克、莫利、道顿的身影。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第1卷，钟叔河编，第87—115页、第128—149页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。

[28] 韦勒克：《19世纪英国文学史的编修》，《辨异：续〈批评的诸种概念〉》，刘象愚、杨德友译，第139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。

[29] 蒼梧洞主：「坪内博士の英文学史を読む」（帝国文学第十二），坪内雄藏：『英文学史』，第1—4頁，東京専門學校出版部1902年版。

[30] 据坪内自述，莎士比亚的生平材料较少，他所写的传记依据了最新的两种成果：Hiram Corsom的 *Introduction of Shakespeare* 和 Sydney Lee 的 *A Life of Shakespeare*。坪内道

遥著：『英文学史』，第206頁。

[31] 泰纳《英国文学史》的第二部第四章为“莎士比亚”，分为九节，主题分别为莎士比亚的生活和性格、风格、风度、登场人物、才智之士、女性、坏蛋、主要人物、幻想，打破了古典派论述莎士比亚的框架。泰纳：《莎士比亚论》，见歌德等《莎剧解读》，张可、元化译，第1—116页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。

[32] 坪内雄藏：「マクベス評訳の緒言」，『文学その折々』，第45頁，春陽堂1896年版。

[35] 叔本华：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，石冲白译，第340页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。

[36] 吴汝纶：《答严几道书》，《吴汝纶尺牍》，徐寿凯、施培毅校点，第174页，黄山书社1999年版。

[37] 钱基博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，第5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。

[38] 钱锺书：《中国文学小史序论》，《人生边上的边上》，第99页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。

[40] 如1911年黄人编纂的百科全书中“文学”的定义，便体现了清末文坛对“文学史”观念的接受维度。参见陈平原《晚清辞书视野中的“文学”——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07年3月第2期。

[41] 王国维：《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118、119号，1906年2月。

[42] 矢野峰人：『日本英文学の学統：逍遥・八雲・敏・秃木』，第14頁，研究社1961年版。

[43] [48] 浦江清：《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》，《浦江清文存》，张耀宗选编，第125页，第126页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。

[44] [46] [49] [50] 王国维：《宋元戏曲史》，第72页，第97页、第98页、第100页、第104页，第120页，第127页，岳麓书社2009年版。

[45] 坪内逍遥以“理想”与“人情”来划分莎剧的四个时期：一、二两期“偏于理想”，二期之末“始离于人生表面，而一探人生之究竟”；至第三、四期，悲喜剧形式和作品中的人生观皆大成，并“含有一种不可思议之魔力，以左右人世”。《莎士比传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159号，1907年10月。

[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]

责任编辑：高华鑫